



# 難忘歲月

余貽驥回憶錄

余貽驥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少年不畏战时难，越驼峰，渡重洋，为求学艺历险去异邦。  
欣喜胜利归祖国，尽心力，历时艰。  
八十五载一瞬间，两鬓霜，志未残，喜看中华纸业日辉煌。  
英才辈出创奇迹，齐奋勉，共兴邦。

# 难忘岁月

## ——余贻骥回忆录

余贻骥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 / 余贻骥著.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19-6576-2

I. 难… II. 余… III. 余贻骥—回忆录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8839号

责任编辑：古 倩

策划编辑：林 媛

责任终审：滕炎福

封面设计：伍毓泉

版式设计：王超男

责任校对：杨 琳

责任监印：胡 兵 马金路

出版发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邮编：100740）

印 刷：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 数：206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19-6576-2/TS · 3834 定价：32.00元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010-65241695 85111729 传真：85111730

发行电话：010-85119845 65128898 传真：85113293

网 址：<http://www.chlip.com.cn>

Email：[club@chlip.com.cn](mailto: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80949K4X101HBW

## | 前言

我出生于1918年（民国七年），在迄今90年的生活中，遭遇了20世纪国内外频繁的战事和政治动乱，也有幸看到高速发展的科技成就，以及我国从严重的外忧内患中，逐步走向繁荣兴盛的新世纪，这是一个既令人饱经磨难，又深为振奋难忘的时代。当我年过80，仍积极参与各种造纸事业活动期间，部分熟悉我的同行朋友建议我花点时间写个回忆录，以便朋友们对我的经历有更多了解，还认为我这个毕生从事造纸事业的人，个人经历也能从一个侧面见证我国造纸工业发展的沧桑。我的儿女们，特别是长女晓青，觉得我偶尔与他们闲谈到的童年及家族故事，学习与工作的一些经历，感到丰富多彩相当曲折有趣。晓青在1998年我与老伴到美国与她共度80周岁时，鼓动我写个回忆录留给他们姐弟和亲友阅读回味，并认为我的回忆录也可以反映我所处时代变迁的某些轨迹，可供人参考。此后她还根据我谈及的部分早期故事，为我整理了可作写回忆录参考的资料寄给我，希望我加以利用写成我的回忆录。他们的建议对我有所触动。这期间我也收到国内部分朋友寄给我这类他们已出版的回忆录书刊，读后也很感兴趣并受启发。但我对自己一生经历是否应该作一系统回顾记述，却一直未下写作决心，也就没有认真考虑究竟写些什么、如何写，一再考虑未曾动

手。直到2007年秋，即将进入整90，亲朋好友纷纷组织了祝贺，并敦促将出版我的回忆录作为纪念我90高龄，以及从事造纸事业62周年活动的一项内容，才匆忙构思着手。但我既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重视保留个人笔记、来往信函等，只能凭借部分尚存的证件与书刊，主要依靠记忆所及，将经历分成几个主要阶段，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匆匆成稿，勉强按时交付出版。没有认真修改充实，而且由于精力与记忆日差，有许多应该提到的经历，不少前辈与亲友的重要相关事迹等，疏漏甚多，记忆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在文字方面，不但“略输文采”更是“大欠风骚”，仅是没有虚构的平淡白描而已，敬请阅览的亲友及有关读者能见谅这份回忆录的诸多缺陷。

由于回忆录记述的多属现在尚能记忆的难忘部分，因此将这份比较杂乱粗糙的回忆录简称为“难忘岁月”。对此书能够出版，我在此谨向提供宝贵赞助和支持的中国造纸学会、《纸和造纸》编辑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以及对此关切指导的各位好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余贻骥

2008年7月谨记于北京 时年整90岁

# | 目录

- 1\_\_ 第一篇 童年 故里 家族 (1918—1924)
  - 2\_\_ 长沙故里
  - 3\_\_ 家族和宗祠
- 7\_\_ 第二篇 并非平静的学生时代 (1924—1941)
  - 8\_\_ 小学时代
    - 8\_\_ 就读六年一贯的长沙修业小学
    - 9\_\_ 小学时期的家庭情况
  - 11\_\_ 中学时代
    - 11\_\_ 初到上海 就读初中
    - 12\_\_ 返回长沙进入雅礼中学
  - 15\_\_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活
    - 15\_\_ 不能北上燕京 借读长沙临时大学
    - 16\_\_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22\_\_ 第三篇 创办战时工厂与颠沛流离体验 (1941—1943)
  - 23\_\_ 离开昆明返湘探亲

- 24\_ 参与湖南战时工厂生产建设  
27\_ 日军进逼被迫离湘流亡  
29\_ 再返昆明得师友相助并考取留美
- 31\_ 第四篇 留美心影（1944—1946）
- 32\_ 漫长而艰险的赴美旅途  
33\_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社会的感受  
34\_ 缅因大学生活杂忆  
37\_ 值得珍惜的美国南方之旅  
37\_ 宝贵的工厂实习  
39\_ 南方对黑人的严重种族歧视  
40\_ 结识极受当地钦敬的唯一华人家庭  
42\_ 参加和访问美国造纸技术学会（简称TAPPI）
- 44\_ 第五篇 归国就业造纸企业十年（1946—1956）
- 45\_ 开始就业辽宁制浆造纸公司  
46\_ 初入东北  
47\_ 任职营口造纸厂  
48\_ 难得的考察台湾纸业之旅  
50\_ 调职天津造纸公司 亲历天津解放  
50\_ 被派担任天津造纸公司第二厂厂长  
51\_ 安排迎接天津解放  
53\_ 开始接触党的领导和工作岗位变迁  
55\_ 再进东北  
55\_ 富有特色的吉林石岘造纸厂  
58\_ 黑龙江畔大型制浆造纸厂的厂址探索  
64\_ 吉林造纸厂喜结良缘

65	生产高速发展的营口造纸厂
73	南下广州两年
73	奉调广州造纸厂工作
74	面对艰难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77	第六篇 任职国家造纸行业主管部门（1957—1967）
78	初进政府机关工作
79	机关工作的第一年
81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紧密相连的三年特殊困难
98	从困难中获取教训，经济工作开始有所应变
99	改任造纸局副总工程师
101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104	参加有关中央领导部的工业企业调研工作
106	第一轻工业部的民丰造纸厂“四清”工作队
109	第七篇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5）
	“文革”初期新见识 大字报 红卫兵 战斗队
110	揭批斗 大串联
112	第一轻工业部内的初期“文革”活动
113	“文革”中的年轻儿女
114	军代表进驻后第一轻工业部“文革”的新形势
116	我被点名揪斗抄家和关入“牛棚”
116	“牛棚”生活
117	抄家 扣工资 举办“罪行”展览
121	固安“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教育
121	初到干校
123	在干校的养猪生涯

- 126\_ 林彪事件推动“文革”拨乱反正的渐变  
127\_ 告别干校亲人小聚南下广西  
127\_ 调回北京亲人小聚  
128\_ 安排南下广西  
129\_ 作客广西柳江造纸厂

## 134\_ 第八篇 “文革”之终（1975—1977）

- 135\_ 变化中的大环境和新的工作岗位  
136\_ 重点关注制浆蒸煮废液的回收利用与处理  
138\_ 北大荒劳动多年的儿女  
141\_ 惊天动地的1976年  
144\_ 改革开放的前奏  
146\_ “文革”遭受失学的青年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  
147\_ 环境保护成为科研工作重点  
148\_ 呼伦贝尔盟之行

## 151\_ 第九篇 从花甲到古稀（1978—1988）

- 152\_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153\_ 北欧考察之行  
160\_ 参加华国锋主席的迎春座谈会  
161\_ 为利用木材作造纸原料的合理性开展宣传  
161\_ 入党  
163\_ 不断膨胀的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168\_ 学会活动  
171\_ 赴日考察  
174\_ 创办《中国造纸年鉴》  
176\_ 几位毕业生从事造纸创业建设的前辈

179 第十篇 中华盛世振奋难休（1988—2007）

- 181 应邀参加1988年芬兰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182 学习使用个人电脑  
183 1989年的北美行  
186 参与国家造纸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188 参加有关造纸专业书刊的编辑工作  
189 参与一项软课题的科研项目 成果获一等奖  
190 受聘高等院校  
191 纸业辉煌 催人振奋奔波  
231 老境日深的迟暮之年  
232 进入90的思考与感恩  
  
236 读稿后记

243 附：

- 243 余贻骥大事年表  
248 春满松鹤楼——余贻骥先生九十寿辰庆典侧记  
251 行业之宝

# 第一篇 童年 故里 家族（1918—1924）

长沙故里  
家族和宗祠

## | 长沙故里

1918年8月23日（民国七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我出生在长沙市内父母租赁的一家小民宅。大约4岁时，由于父亲从军远去广东，母亲带我回到离长沙市区约35公里的祖辈故居。长沙故居是我大曾祖建立的家产，位于长沙东乡安沙镇大苦竹坳。它是一所在当地被称为“义学”的较大宅院，是具有相当气派的独家私宅。可能因为在这里曾经办过义务学堂，一直被称作“义学”。故居有相当宽敞高大的门厅、轿厅、客厅、教书厅、居室，还有宽大的厨房、烤火房和加工稻谷的碾米房、猪圈、谷仓等乡村生活所用的各种杂屋。曾祖辈在原有建筑的西侧扩建了双层的西式楼房与花园，号称“洋屋”。据长辈们说，“义学”共有各类房舍108间之多，在当时的长沙东乡颇有一点名气。但其所在的大苦竹坳，确是一个小山坳，宅后30米左右的小院落就紧靠一座长满青松壁立的小山，从“义学”的前门放眼眺望，只能看到小坪前的一个小池塘。小片的稻田之外，似乎三面都被绿树成荫的小山环抱，几乎看不到其它民宅。对外交通，主要靠田间的和傍山的小道。出行与运输都只能依靠步行、扛抬和独轮小推车。对于几岁的幼童来说，这里是一个难于独自外出和结交邻居童伴的孤僻环境。在我四至五岁返居故里时，余家较年长者，特别是男性多在城市和外地求学和工作，只有少數年长妇

人和儿童留住此地，大量房舍都闭锁无人，但家人仍注重对留居儿童的教育，请有私塾教师，为当时留居的几名儿童做启蒙教学。老师极受家人尊敬，居室布置优美，单独享用特供餐，并被授予教鞭和随意体罚鞭打学生的权力。作为仅有的几名幼童之一，我跟从私塾老师念了一年多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大概由于学生乖顺，老师和善，我不记得曾有人挨打受罚的事。6岁时由于要接受新式小学教育才离开故居返回长沙市内。

## | 家族和宗祠

我的大曾祖端本公，是故居的拥有者。经科举进入仕途，共有四个儿子（我的曾祖辈）也都继承父业。至我祖父辈，曾共有嫡堂兄弟13人，姊妹19人，因此时清末国事积弱，备受列强欺凌而被迫废科举、办学堂、兴洋务。我祖父辈因时应变，放弃科举旧学，另创新路。在我童年时，祖父辈中排行第八，诙谐而健谈的范传公谈到他自己的几位兄长情况时曾说：他的一、二两位大兄长都在童稚之年受到惊吓而死，有一位是在一次雷雨中受雷鸣惊吓而死。他认为连雷声都能被吓死，长大了也难有出息，不足为惜。而他的三、四（我的祖父）、五、七几位兄长则多在二十或三十多岁就因痨疾早逝，均未得一展抱负实为可惜。范传公自己则有幸被选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骑兵，成为余家当时仅有的一名军人。他学成后回到北京，逐步被升任为满清宫廷禁卫新军的骑兵队长。在一次由慈禧太

后主持的阅兵式中，范传公这个戎装骏马上的英俊骑兵队长竟受到慈禧的欣赏，被特别召见。太后问他是否有“媳妇”，意指他是否有妻室，但长沙人讲媳妇是指儿媳妇，范传公虽然已婚，但无儿媳，因此回答说没有。后来慈禧让人告知，他既无“媳妇”，就准备将一位皇室的格格下嫁给他。这可将他吓坏了，因将有妻室答称无妻室，让太后赐婚实属有罪，而且家庭也难处理，只得千方百计托人向慈禧解释因方言不同而引起的误会，幸而得到谅解作罢。范传公说，如果余家弄回一个格格作媳妇，真不知会出现什么难堪的局面。他的九、十一、十三，三个弟弟及最年幼的十九妹共四人则有幸均去美国留学，分别学习经济、工程、文学与教育，都比他这个学军事的对国家建设有所贡献，而且在家族中树立了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和独立创业的进取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义学故居的族人都入城就学或工作，仅在特殊情况下，如抗战初期长沙等城市被日机轰炸，而到故居短暂停住。到抗战胜利后，这里几乎没有余家人居住，而主要依靠雇人看守家宅了。

族人纷纷离开家乡私塾，到城市进学校求学。祖父辈中，比较年幼的弟妹中，到国外留学的就有5人。如前所述，祖父的八弟范传公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骑兵，回国后，曾任晚清宫廷侍卫的骑兵队长及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九弟啸秋公留学美国专修经济，回国后曾长期担任著名的民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主管财务的协理。

十一弟籍传公留美学土木工程，曾长期担任湖南省公路局长和建设厅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任南京市工务局长时，有过一段为难而有趣的经历，事情与建造蒋介石官府有关。当时，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对于其官府的门框梁柱采用什么颜色喜好不同：一个主张红色，另一个喜爱黄色。夫妻的不一致给当时负责监理该项工程的市工

务局长出了难题。深思之后，籍传公决定采用红黄相混的橘红色。这一折衷取色做法，竟使蒋介石和夫人都较满意而渡过难关。

祖父的十三弟楠秋公留学美国专修文史，以后曾长期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最小的十九妹惠传留美学习教育，曾任湖南省立长沙女中校长。祖父一代学以致用，开辟了进高校学习专业之风。到我父亲一辈，除从业、从军外，绝大多数毕业于国内大学的理工医文法等专业，少数留学英美。这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家族，成员们几乎都以不能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不能离家独立创业进取为耻；在这种情况下，家乡的“义学”故居也就逐渐成为没有余家人居住的余氏故居。

长沙余氏家族除我们原住“义学”的这一支外，还有部分散居在长沙东乡各地的，当时按族中男口统算不足百人。余家在长沙东乡的留嘉冲，建有一座余氏宗祠，其内供奉的始祖本生公，是由江西西迁定居长沙的第一代始祖，也是一位读书人，到我这一辈已是第十二代了，对子孙训教以读书应试科举入仕为主，所以后代读书人多，经科举而宦途通达者也不乏其人，余家在长沙因此小有名声。曾祖的一位堂弟肇康公，曾在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出任过清代的工部主事、两湖提学、山东和江西按察使等职。正是他们这些仕途宦达的子孙，为了光宗耀祖，修建了这所宗祠公产。据长辈讲，祠堂每年都有较隆重的祭祖典礼，外地有专程赶回参祭的。我隐约记得在5岁左右曾随“义学”的两位长辈去祠堂参加一次冬至祭典，有赞礼（司仪），主祭读颂词，齐叩首分献祭礼，鼓乐鞭炮齐鸣，很是隆重。为了鼓励繁衍后代，族人用祠产对家族里每位男童自出生开始至16岁为止，每年发给稻谷两担。鉴于乡间出现个别穷困户有溺杀刚出生女婴的惨事，余家宗

祠立下规矩对每位刚出生女婴给予一次性的16担稻谷作为养育费，以后不再逐年派发。这座祠堂房舍相当大，部分房屋一直用来做义务学堂，免费对附近贫困儿童授课，对余氏子女则免费供应食宿，照顾住读。想起来，这个不大的家族颇有一些特色。

幼年时曾听祖辈闲谈时谈到，长沙还有其他余姓氏族，但都与我们这家余姓联不上宗（即从族谱中找不到纵向或横向的先祖联系）。据长辈谈及，原因是我们这一族系原来并不姓余，真正的先人是明代的知名大儒方孝孺。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由已故太子之子继位。可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即明成祖），在燕都拥有重兵，不满侄儿继承皇位并图谋削藩，起兵攻克南京，夺其侄之皇位。为免“篡夺”之讥，燕王令当时朝中声望最高的大儒方孝孺为其撰写继承皇位的“劝进书”，方誓死不从命，被朱棣诛杀九族。方家仅有子不在南京，被人冒险匿救，在江西隐姓埋名避过灾难。这一遗孤就是我们的先祖，改姓为余，可能暗寓“劫后余生”和“漏网之鱼”之意。大儒之后，家学渊源，一直保持了对子孙鼓励读书仕进的家庭传统。但在明代根本不敢恢复原姓，年代一久，复姓很难，也就维持了这个无法与其他余姓联宗的姓氏了。方孝孺是被族灭的家庭，这个传说很难找到历史凭证，因而也就成了我们这个余家的原始姓氏之谜，成为我童年的记忆之一。大概比我年轻的族人，都少有机会听到这种故事传说。

## 第二篇 并非平静的学生时代（1924-1941）

小学时代

中学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学生活